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ING PROJECT

26

延安 文艺大系

—— 主编 刘润为 ——
译 文 卷 · 下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延安文艺大系

译文卷下

主编 张建儒

任一鸣

湖南文联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报告文学

文藝大系

“另一个法国”

□ 爱伦堡
戈宝权译

(一)

巴黎的报纸《巴黎晚报》这样声言道：“我们行将刊载关于‘另一个法国’的生活的消息。克勒蒙——菲朗曾经对于巴黎是一个省份的城市；而现在它是成为‘另一个法国’了”。

在两个法国之间传递消息，是很困难的：书信只能偶然收到，并且是稀少的；电报和电话都不工作了；火车也停止行驶了；“另一个法国”的报纸是不准寄往巴黎的：依照讲和的条件，“另一个法国”的无线电台是完全寂然无声了。巴黎不知道克勒蒙——菲朗，萨摩日和土鲁斯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在六月底我出发了，我不是到一个法国的省份去，而是到一个毫不知晓的秘密的国度里面去的。

我们乘车沿着大道走，这条大道曾经是称为“蔚蓝的大道”的：两旁排列着华丽的旅馆和饭店，装置着汽油亭和广告，这条大道是由巴黎通到尼斯去的。这条“蔚蓝的大道”，成为一条苦难的大道了，到处都是废墟，烂布堆，垃圾堆，还有丢掉的箱子，步枪，孩子的玩具和坟墓。深坑，被烧毁了的车厢和汽车，都讲出了这是轰炸的成绩。在一个名叫洛里斯的小村子旁边，有

许多的木架，正像一个小丛林一样，在木架间放着兵士们的钢盔，再远一点，我们又看见了许多没有钢盔的木架：这是逃难者的坟墓。所有的大道上，都堆满了汽车、被烧毁了的，被破坏了的或者是被枪弹穿透了的。

到了罗亚尔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几百辆完整的汽车被丢在大路上。

大约在五年之前，我曾经到过齐昂城。我这次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认出这个城市。它本来是美丽如画的，是幽静的，并且是以陶器和糖果闻名的。现在沿河岸的一带都没有了：齐昂是被飞机所毁灭了，只有在城边上还矗立着几所空洞的房屋。

后来我们又经过了十几个被杀害过和伤害过的城市。我们沿着边疆走，这一带向来是以美丽的白葡萄酒而著名的：桑寒尔、普伊和洛日等地方都被破坏了：村庄都被毁坏了，我们只遇到很少的人；农场大部分是被抛弃了，常有一些吃不饱和像要发疯的母牛在那儿回旋着。面包都是烤焦了。这些城市都拿紧闭着的铁户，孤独的老太婆和寂静来迎接我们。

在罗亚尔河的夏丽台城，有许多被俘虏过去的法国兵士，在德国兵的监视之下修理着桥梁。在靠近慕兰的地方，有许多被俘虏的北菲兵士在大道上工作；德国的军官们还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沿途都是军队在走着。到处都写着德文的题字，这些字是用油漆写成的，因此看起来像是很久了，并且好像时时刻刻都是悬挂在那里的似的。

我不由自主地用双目去搜寻左拉作品中的农民。搜寻那些在两度战争之间收割五谷的农民；但是很明显的，现在一切的东西都改变了——无论是战争无论是农民：人们都跑光了，麦穗在田野里面空待着有人来收割。

我们把车子开到了慕兰城；这是被占领区的最后的一个城市了。

在当地的《阿里爱进步报》上，我读到了一段惊奇的，题名为“黄昏到了”的小文章。我把它剪下来！这是莫泊桑的作品的一九四〇年的续本。

“工作日过去之后，当黄昏的时分坐在窗口，呼吸着晚凉的气息，这是最愉快的事情了。这是种休息，疲乏了的头脑是多么需要休息呀！”当然，已看不见风景了——只看见街道，在街道两旁是上了锁的商店。夜色降临了。在黑暗里面，有兵士们走过去。我们的城市慕兰，早已不知道这种生动的情景了。兵士们在街道上漫步着。在遇见的时候，免不了总要交谈几句话。

“妇女们为了满足她们的好奇心，就和占领的兵士们攀谈起来。他们互相都不了解，他们讲着不同的语言，但这并不要紧，他们总归是会互相了解的。

“有一个女人讲道：‘我的未婚夫在威威尔兵营附近被打死了’。那个兵士没有讲话：他不懂。他敬了她一支香烟，她就机械地拿过去了。她讲道：‘这真是不幸，他不了解我向他讲的话。……’在旁边还有另一对人，他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那位兵士也敬了和他交谈的那个女人一支香烟。我们应该猜想出，就是香烟会更加促进大家的亲近的。

“这样他们就一起走了，——两对人，都是完全毫不关心的。这是守备的城市中的一幕演出。”

这段文章，是登在六月二十九日的报纸上，而当六月十八日时，德法两国的军队还在慕兰交战呢。

“另一个法国”是以骚音、混乱、叫嚣、及以人和汽车的杂沓来迎接我们的。“另一个法国”并不是在定居着，而是在漂泊着。在大道上，盖着叶荐的巴黎汽车还是在行驶着。只要得到了

一筒汽油，他们就再走上一百公里，他们是在尽力地想寻觅一个藏身之所。在树子林里面，我看见了我的旧相识——巴黎的公共汽车；它们现在是变成了难民的住家了。

大家都知道，巴黎是已经宣布为一个“主要的省份的城市”。政府也正像其他难民一样，是在漂泊着。它在过都尔，它也在过波尔多。当我乘车到了“另一个法国”的时候，政府是在克勒蒙——菲朗。可是在这个城市里有特别多的工人，贝当上将就赶忙又搬到维琪去了。他在那儿开始幻想出一个真正的首都：猜想起来，他所想的不是罪恶深重的巴黎——凡尔赛。

(二)

在若德广场上，这是克勒蒙——菲朗的一个主要的广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的仪式：在这不久之前，德国人才离开这个城市的，并且为了纪念政府的来临，特别下令挂起法国的国旗，人是很多的：其中有的是当地的人，有的是难民。他们都阴郁地在静默着。难民们在想着夜宿的地点，而当地的居民，则想着那些毁坏了一切东西的蝗虫。有几个官员懒惰地高呼着：“贝当万岁！”

我们在城里面走了整天，想找寻外交部。最初有人告诉我们，说外交部是在县政府里面。在那儿所有的门都洞开着，一群人，房子里面走来走去，寻问谁是部长，在有一间房里面，有人向我叫道：“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赖伐尔先生的私人办公室吗！”据道途听说，外交部是在邻近的鲁阿尔的休养区里面，但是当地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外交部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我说：“共和国的总统是住在此地一所旅馆里面的。大概，他们知道他们的部长是在什么地方”……最后我们才知道，外交部是在克

勒蒙——菲朗，设在一所男子中学里面。在中学校里，我们仅仅找到了一位端正的看门人；他用鼻子恶意的哼了一声，说道：“感谢上帝，还没有人到此地来过。”外交部就这样不知下落了。……

在这个破灭了的不幸的国度中，政府特别专心于举行各种宗教的仪式，六月二十五日政府下令在波尔多举行了一次华丽的追悼会和一次华丽的祈祷会。贝当上将穿了常服，而魏刚将军则穿了军服（报纸曾详细地描写这些英雄们所穿的衣服）。天在下着雨。警察们在欢迎上将和将军。过了两天，政府离开了波尔多（德国军队开进了这个城市），又在克勒蒙——菲朗下令举行一次新的追悼会。

政府宣布了“国哀日”，看起来就好像其他的日子，都不是国哀日似的。“静默一分钟”也已经宣布了，但这一分钟是延长下去了：全国或几天地，或几周地，或几月地在静默着——因为人家不让它讲话了。此外还又拟定了新的《宪法》草案。贝当上将在凡尔登的时候，简单地称自己为“我”，但在维希的时候，却成为“我们，斐列普，贝当”了，关于《宪法》大家都这样讲道：“独裁，再稍微加上一点矿泉水就行”（因为维希是法国出产矿泉水的地方）。

政府的权力，仅能及于政府所在的那一个城市。在土鲁斯，没有人会听信波尔多的话，在里莫日，人们则甚至蔑视克勒蒙——菲朗。

政府害怕人民。六月二十日，马赛的县长劝说人民不要讲出他们的愤慨。六月二十一日，波尔多的大主教在无线电上广播：他这样号泣道：“弟兄们，忏悔吧和祈祷吧！”而在港口里面的脚夫们则重复地说道：“出卖了！”六月二十五日，部长伊巴纳伽莱召集退伍军人，就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参加过战争

的旧兵，来保卫“秩序”以防范从前线归来的现役军人。

在“另一个法国”，我看见过很少的警察；他们是事先讲好不在街道上出现的。在靠近夏托顿附近的地方，宪兵们想放政府的汽车在排列的队伍外面走，因此大家的人都在喃喃絮语着：“无理得真够了，为了无理我们就打了败仗！”这样宪兵只好退步了。

六月二十八日，贝当上将向全国作了一个充满真情的演说。他向在大道上漂泊的难民，被瞒骗了和离了队的兵士，以及在法兰德斯失掉了丈夫的女人们说道：“不要依赖国家吧！把你们的孩子抚养起来，他们会赡养你们的。”在听了这段话之后，法国人都知道：“国家送我们到前线去打仗，它剥夺了我们的安身所和工作，它从我们身边夺去了丈夫和儿子，现在它又在宣言说，不要依赖我吧！”

在大道上，在“另一个法国”，在它的城市和乡村里面，大家都讲起很多的事：“他们要这样做的！”“一切都是按着谱子表演出来的！”“出卖了！出卖了！出卖了！”

人民的怨言传达到了政府，政府就企图用烟幕弹来掩饰一切：“我们是反对财阀政治的”。谁说这句话的呢？是拉伐尔，他曾经是一个穷律师，当权之后就发富了，购买土地，一变而成为法国的第一个大地主。是外交部长——银行家鲍多恩。是情报部长，纺织王及《巴黎晚报》老板——布鲁姆。报纸上登载了摘要“财阀政治”的文章，而在这些文章的下面则有这样的报告：“从前在巴黎拍卖的一切贵重的东西；昨天又在波尔多拍卖了。交易所的行情有了上涨的趋势。”

资产阶级还不能意识到当前的惨剧。他手里面拿着一束股票，他还不愿意相信，就是这些股票，仅是一束废纸而已。在逃亡的时候他在奥里安附近丢了一辆汽车，但他坚决地希望，就是

左 右 文 艺 大 系

他还能找到它。

上流社会的俗物还是继续在逍遥作乐。六月二十一日，吉隆特地方的县长不得不下一个特别的法令，禁止太太小姐们穿了“短裤”在街道上散步。

我在鲁阿尔的一家时髦的题名为“塞罗尼侯爵”的糖果店铺里面，看见了这一批俗物。在此地有前任与现任部长们的姨太太、有律师、有银行家、有新闻记者，其中还有《资产阶级道德之死亡》一书的作者柏尔先生。这是在逃跑中的香榭丽榭。而在糖果店的附近，则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饥饿的人在踯躅着。

为了和战胜者讲和，政府特别选出了诺厄尔大使。半官方的报纸《时报》，在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的报纸中曾这样很满意地讲起关于他的事情，他首先是法国保安局的局长，其次是驻波兰大使，最后就因为他是一个反对亲苏的人。

(三)

在大家谈起“啊呀！快要打仗了”的日子里，报纸常讲起“神圣同盟”，这个同盟等于实现了；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面前看见了一个真正的敌人；他们不害怕德国人来占领土地而是害怕人民的愤怒。所有的人都在高声说“我们——菲利普”的四周围团结起来了：其中有保皇党的查理·莫拉斯和“社会党”的斯四拉斯，利叙亚的“消防员”及勇士魏刚和“反军国主义者”拜稜，有自私自利主义者的旭丹和冒险家陶里欧。带有“塞罗尼侯爵”糖果店作风的报纸，讲起“法国人的手足之谊”。只有共产党他们认为还是敌人，《自由报》这样写道：“看吧，托莱士先生和贝里先生是怎样处置了法国……”

报纸在漂泊着，空想能赶在政府后面：既没有大的印刷所，

也没有纸张。巴黎的报纸一会儿在里莫日出版，一会儿在波尔多出版，一会儿又到了克勒蒙——菲朗。这都是些可怜的薄篇幅，使人回想起那“主要的省份城市”——巴黎的报纸所采的方向和作风来。部长布鲁姆的报纸《巴黎晚报》也在“另一个法国”出版，因此《巴黎晚报》这一个地方版的编辑部，拒绝负另一个地方版的责任：但是将报纸拿来比较一下，我就了解了，它们所写的还是同样的东西；只有在里莫日报里面，没有德文的广告。在《巴黎晚报》上面，我读到一篇题名为“欧罗巴的垃圾箱”这样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外国的亡命者：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捷克人、波兰人把法国断送了，——他提议把他们驱逐出去。但是此地值得提及的，就是当战争的时候，法国人还动员了“垃圾箱”来“保卫自由的国度”。

火车不开了，汽油没有了。军队开始自发的瓦解了。兵士们在森林里面，在田野里面，在山里面，拿着棍子在乱跑着，就正像卓别林所演的“流浪者”一样。没有人送他们回故乡和哺养他们；宽广的庄园在向他们关上大门。我在各条大道上，看见了成千的这样的“流浪者”，他们被所有的人遗弃了，在贝当上将的演说之后，他们更是不被瞭望的人们了。

为了执行和约的条件要交出所有的军用品，政府不仅竭力搜尽了一切武器，甚至连手榴弹都搜尽了，政府从来是不想起人民的。此时，某些人还提议组织一个特别的“复员部”，这是因为参谋本身不能处理这个任务。

在同一个时候，又有人提议动员一千一百万难民，而藉此来防止他们的漂泊移动。但是政府既不能动员，也不能复员：它只能举行追悼会和登记坦克车的数目而已。

在波布勒休养区，杜美尼尔海军上将在为外交官分配房间：他成为矿泉水的海军上将。……军需部是设在休养区曼道尔地

方。我们很容易想像出，就是在投降之后，这一类部长能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奢侈的将军们，在休养所地点的各处店铺里走来走去。早晨的时候，患了喘息的一些人穿着各式睡衣在街道上出现着，就宛如参加一出化装跳舞会一样。

从曼道尔到布里夫的大道，是特别美丽如画的。我看见了羊群，静谧的牧羊人，和山里的溪流。但这只是很短促的一瞬；而同时眼睛就不见了。在山上或是在大路旁有离伍的兵士，有难民和篝火，和毁坏了的卡车的骨骼。

在战前，布里夫是讲究美食者的天堂。现在布里夫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难民已经吃掉了一切的东西。农民也不运东西到市场上来。烟草铺也关上大门了。在旅馆里面，悬挂着“客满”的牌子。而情形更坏的，就是工人聚处的里莫日。大群的难民拥挤在一起：有些向后走回到北方去：有些企图转向南方去，回到还没有被践踏的牧场里去。

有成千万的汽车开往北方：巴黎人希望回返到巴黎去。在拉苏泰伦附近，是法国的第一个关卡。宪兵由于惊吓而口吃的讲道：“不行！德国兵不放你们过去的……”此处有几千辆汽车停在田里面，而更可怕的，就是在威尔松附近的情形，这是占领区的边境，此地有两万多人，有妇女、病人、小孩子，他们都在田里而等待着奇迹。谁也不知道，边境还要关闭多少时候。乐观的人说——一天，悲观的人说——三天；但是边境是要封锁得很久的，或几个礼拜，或几个月。难民们没有地方可去，他们等待着——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火，甚至连水都变成奢侈品了。他们害怕地询问着宪兵：“你们不放我们进去吗？”宪兵们答道：“我们只放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而法国人不放。”

法国的中部因为轰炸而损害得特别厉害。德国军队在占领了

巴黎之后，就毫无阻碍地向南方推进。抵抗是这样的稀少，以致使得他们为此惊讶了。在都尔，市长组织了防御；参加者有市民和轻伤的躺在医院里面的兵士，城市的保卫者，曾经两度毁掉了浮桥。都尔支持了三天；这个城市一部分被毁了。法国兵在索莫尔附近也有过一些抵抗，索莫尔城中心也被毁了。可是在战争最后的几天中，有许多城市都遭到轰炸。黑勒被毁了，在波尔多、在蒙留松、在伊苏登、在里莫日等城，俱有许多废墟。

我在夜里面乘车经过了奥里安。这个城市的中心——就是在洛亚尔河与车站之间的地方——全被毁坏了。我们看见了熟悉的图景：石头、石头、一切人类破坏的畸形物——这是城市的骨骼。我知道奥里安，我记得那些房子、商店、咖啡馆。

在月光之下的废墟，是使人难堪的：从这些废墟里面，透出一阵尸首的强烈的气味来。

继而我们又走过爱丹普尔——重新又走废墟。已经是黎明的时候了。云雀在田里面歌唱着，树木在曙光里面显出黑色的影子，就正像画在版画上一样。靠近深坑的地方，还躺着一个小孩的手摇车和玩偶。

庄文哲大系

德国奴役下的波兰

□ 丁 明译

“将军政府”统治区域内的工人的生活是极端苦痛的生活。在华沙和“将军政府”的其他地区的工业完全停顿了。实际上所有的纺织厂都停闭了；只有小手工作坊和一些制造场开工。

占领者所组织的强迫劳动，是许多工人家庭的仅有的收入方法。那些家庭的赡养着已被送到德国去了的家庭，偶然收到一两封信和数量很少的金钱。其他工人被雇从事占领者的公共土木工程之劳动，以获得菲薄的工资。

其余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形呢？很多人从事干小本贸易；他们将衣服和家庭器皿带到乡村里去出售，藉以博得绳头之利，买点生活资料。在今天，看见从前的教师和艺人在华沙街道上销售领结和袖扣，是很平常的现象。这种“生意人”的数目如此巨大，以致他们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由于计口授粮券所允许供给的食物为数太少，为了苟延残喘，大量的物品便不得不被带到市场上来。计口授粮的分额是：波兰人每天二百五十公分面包，犹太人一百二十公分半，每三月马铃薯五十公斤，波兰人每月煤五十公斤，犹太人二十五公斤。

这些都是重要物品。肥皂很少有卖，盐只有很少量，果子酱、肉和油简直没有卖。但是这种很不够食用的计口授粮制并不适用于全体在波兰的人。在“将军政府”里面谋生的德国人，得

到像在德国一样多的物品。他们有特别的商店，咖啡店和饭店，而这些，波兰人是不能接近的。

食料的极端缺少，已经使市场上的物价大大的高涨。例如一百公斤马铃薯在市场上的价格要二十五基纳梯（波兰币名），这较平常的价格高达六倍以上。其他的物品也同样的昂贵起来了，农民进城不准携带物品——特别警察支队和巡逻队没收所有从铁路与沿公路而来的人身上发现的食料。因此，饥馑在农业很发达的国度里流行起来了。

虽然波兰人被给予在市场上购买的可能，可是这对于犹太人是不如此的。他们被驱入有铁丝网环绕着的犹太村中，要进入这个村庄，持有特许证才行。

与饥馑相伴而来的是这国度里文化生活的下降。许多大学，专门学院，高等学校都停闭了。一些公共学校也仍然还未开学，戏院没有营业，无线电广播也没有。只有一种波兰文的报纸出版着。

电影院放映德国影片。许多电影院和许多咖啡店，饭店一样，不准波兰人进门。被驱逐出波森和罗兹及其他城市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情景是异样的可怕的。他们麇集于人口过多的城市中，形成无家可归的饥饿的一族。

描绘在这些城市里的波兰人的处境的人说，在波森，波兰人是不准与德国血统的妇女结婚的。夜晚八时以后，他们无权停滞在城市和乡村的街头。只有在白天的一定时间里，他们能够到商店购买东西。在某几个城市，波兰人甚至不准乘搭电车。他们做同一的劳动，所得的代价比德国工人少。

而且，他们要完纳“复兴事业”的特别税。

在从前的波兰当局下，税额已经很高。现在，在“将军政府”的统治区域里，税额更加高了，因为一切关于维持占领军队

与警察、建筑桥梁道路的费用，都通过直接或间接税而加在人民的负担上。关于烟草、火柴、火油和酒精的国家垄断权已经转移到占领者的手中去了。

由于人民大众遭受贫穷的威胁，税收中又遇着了极大的困难。

正是由于燃料缺乏和大部份城市建筑处于颓垣败瓦的情况之中的事实，因此不适于居住，而去年冬天，又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